

諮商師與當事人宗教價值觀衝突的倫理決策 歷程探究—以馬來西亞華人諮商師為例

郭淑梅

邱淑惠*

程雅好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本研究旨在探討華人諮商師在面對個人宗教價值與個案宗教信念衝突時的倫理決策歷程。本研究採質性取向，以馬來西亞華人諮商師為研究對象，透過立意取樣邀請七位具宗教信仰的諮商師參與研究（六女一男，年齡35至68歲），以深度半結構訪談蒐集資料。研究架構以黃光國（Hwang, 2019）之含攝文化知識論策略為基礎，並採模板分析法進行分析。研究顯示，馬來西亞華人諮商師在面對宗教價值衝突時，其倫理決策歷程呈現「外在理性客觀規範」與「內在主觀自我修」之雙元倫理考量，呼應儒家取向之「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型」（Wang, 2022），呈現「內外兼顧」的雙元（雙向度）辯證思維，而非 Van Hoose 與 Paradise（1979）根據 Kohlberg（1958）道德發展理論所倡的單元（單向度）認知發展歷程。本研究亦修正郭淑梅等人（2024）提出之「宗教價值觀衝突倫理決策之雙元模式」，以包含「助人專業衝突」、「知情同意判斷」、「倫理依據判斷」與「倫理行動決策」四階段的倫理考量。綜合而言，當諮商師面臨宗教價值衝突時，傾向以多元文化社會的普世倫理價值為行動依據，而非拘泥於宗教教義。本研究建議實務工作者在專業實踐中應明確釐清個人宗教價值，並提升宗教議題的覺察與倫理敏感度。諮商機構督導應以開放心態協助諮商師在宗教價值衝突的倫理兩難中，做出合乎文化與專業原則的抉擇。

關鍵詞：宗教價值觀衝突、馬來西亞、倫理決策雙元模式、華人諮商師。

* 通訊作者：邱淑惠，email: chiu.shuhui@gmail.com。

DOI: 10.53106/172851862026010075003

壹、緒論

諮商師與當事人討論宗教信仰時宜避免因宗教價值觀而對諮商關係造成負面的影響（Corey et al., 2019），或因造成諮商目標的觀點歧異，進而影響諮商的品質（Kocet & Herlihy, 2014），甚而造成對當事人福祉的傷害（Crockett et al., 2021），此中之分寸如何拿捏即涉及助人專業倫理之判斷與考量。

助人專業倫理強調價值中立以免於諮商師強加個人價值觀而對當事人福祉帶來傷害（Francis & Dugger, 2014; Jackson et al., 2013; Patterson, 1989），並提醒具宗教信仰的諮商師應避免將價值觀強加給個案（McWhorter, 2019），而要在宗教價值觀衝突之倫理兩難困境中，作出合乎專業的倫理判斷，諮商師個人價值觀的覺察與斟酌被認為是倫理決策的核心考量（Levitt et al., 2015），並會對倫理決策與判斷的結果造成重要影響（Cottone et al., 2022）。但過去較缺乏對諮商師與當事人因宗教取向不同而引起宗教價值觀衝突的議題研究。特別是華人諮商師更處於多元宗教的社會，缺乏此等宗教價值觀衝突的倫理研究更值得關切（陳秉華等人，2018）。因此，諮商師面臨宗教價值觀衝突的兩難困境，如何進行倫理決策是實務上有待探討的倫理議題。

據此，本研究旨在探究諮商師遭遇與當事人宗教價值觀衝突的倫理決策歷程，採取質性研究取向，以身處馬來西亞多宗教文化社會情境的七位華人資深諮商師為研究對象。依據「含攝文化的知識論策略」（epistemological strategy for constructing 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Hwang, 2019）之研究理路，進行本土化理論建構之經驗驗證，並運用「模板分析」（template analysis）作為資料之分析策略，以對理論建構所得的「初始模板」進行調整與修正而完成「最後模板」的確認（張芬芬，2021；Brooks et al., 2015; King, 1998; King & Brooks, 2016）。研究結果可提供華人助人專業人員在面臨宗教價值觀衝突時，進行倫理決策之參考。

一、宗教價值觀的專業倫理基礎

一個人的宗教取向涵蓋其個人宗教價值觀，而助人專業要求諮商師需具備宗教敏感以接納當事人的宗教價值觀（Cashwell & Watts, 2010），由於個人宗教價值觀已內化為個人的人生信念，因此當涉及宗教教義與立場的諮商議題容易引起諮商師與當事人宗教價值觀的衝突，比如：酷兒伴侶（Queer partnerships）家庭諮商（Killian et al., 2021）、性取向與性別認同（Bayne, 2016; Minnix, 2018）、教牧關懷諮商（Pastoral counseling）（LaMothe, 1999）、回教諮商（Yadegarfarad & Bahramabadian, 2014）

等，皆容易引起諮商情境中的宗教價值觀倫理衝突，其中涉及當事人權益、尊重、自主權、價值中立等倫理議題，而觸發助人專業倫理判斷考量的思考。

Barnett 與 Johnson (2011) 主張當諮商專業和宗教價值觀產生衝突時，須以尊重當事人宗教價值觀為最大考量，避免個人偏見和價值觀對個案造成任何具傷害性的影響，相關的專業倫理考量層面包括：評估 (assessment)、公開聲明 (advertising and public statements)、知情同意 (informed consent)、能力 (competence)、界線和多重關係 (boundary issues and multiple relationships) 及與其他專業人士的合作 (cooperation with other professionals) 等。Herlihy 等人 (2014) 就美國所發生之實習諮商師以宗教信仰為由而拒絕為當事人提供諮商服務的真實訴訟案件，指出當諮商師面對個案諮商議題與個人宗教價值觀產生衝突時，可能涉及的倫理責任包括：選擇採取以中止諮商作為倫理決策的程序不當 (dismissal procedures)、接案程序和知情同意 (due process and informed consent) 過程中，未清楚釐清雙方的宗教價值觀，以及不歧視和轉介 (nondiscrimination and referral) 的倫理議題等。上述討論雖能對宗教價值觀衝突的倫理考量提出審視的方向，卻缺乏進一步闡釋諮商師如何基於負起倫理責任以做出適切倫理決策的歷程。

Bayne 等人 (2022) 認為因應諮商情境中宗教價值觀衝突的最大挑戰是根植於諮商師不同的身份認同與價值觀，會使宗教價值觀衝突的議題更為複雜，其研究指出：不同諮商師在處理宗教價值觀衝突的過程，其身份認同可分為：價值擱置者 (the bracketer)、尋找者 (the seeker)、倡議者 (the advocate)、臨床者 (the clinician) 和先進者 (the progressive) 等五個類型。不同類型的身份認同，會採取不同之倫理決策策略。

上述有關宗教價值觀衝突之倫理決策考量乃立基於西方之倫理觀點，即當諮商師面對宗教價值觀與專業倫理發生衝突時，以尊重當事人宗教價值觀為倫理考量 (Barnett & Johnson, 2011; Bayne et al., 2022; Herlihy et al., 2014)。在因應上則主張以中止服務、轉介或持續諮商作為倫理決策的行動結果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ACA], 2014; Cormier et al., 2016; Jones-Smith, 2021; Remley & Herlihy, 2020; Welfel, 2016)。西方之倫理觀點主要建立於個人主義之上，而華人之倫理觀點則建立於關係主義之上 (王智弘, 2016; 黃光國, 2009; Hwang, 2012; Wang, 2022)，與西方文化觀點不一。此外，西方的倫理觀強調對個人權益的維護，因此 Kitchener (1984) 主張當事人的權益有自主、受益、免受傷害、公平待遇以及要求忠誠等五大權益，為心理師普遍性的倫理辨識原則，亦即倫理的原則是緊密的連結當事人的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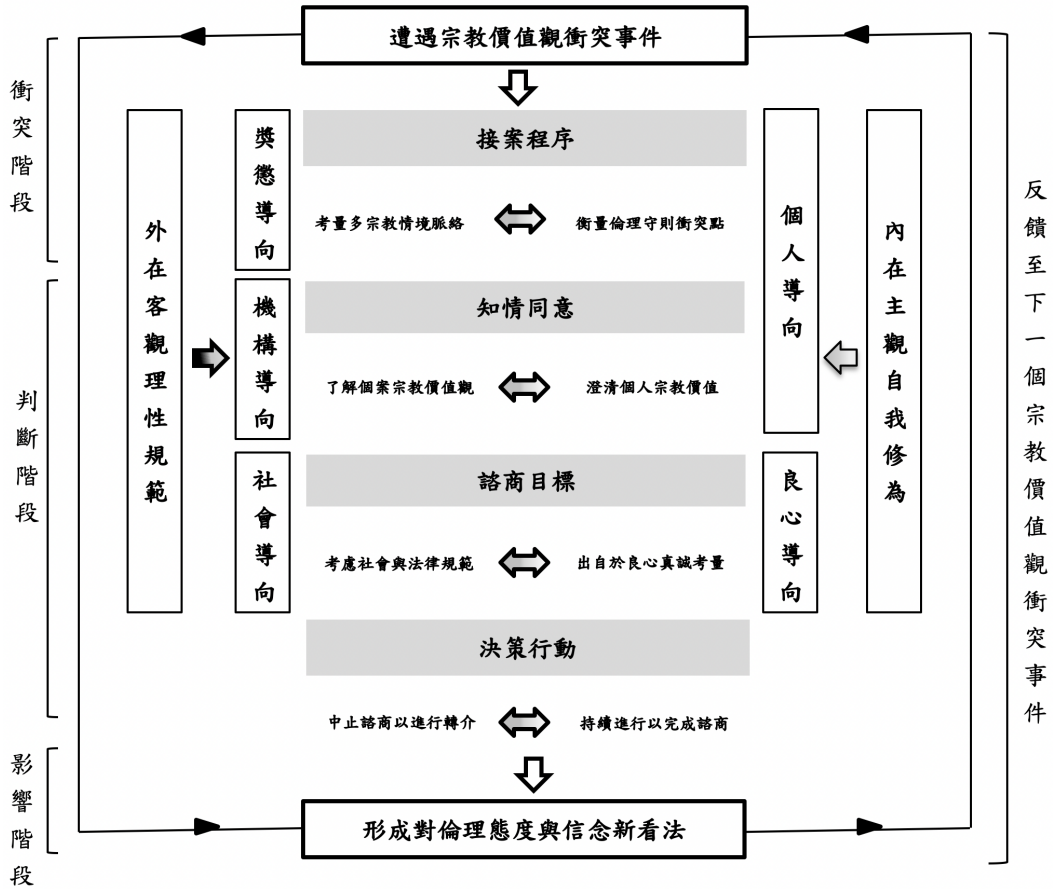
權益維護。而華人諮商師的倫理思維並非只基於對當事人權益的尊重，而是更考慮內心自覺性的道德良知（王智弘，2016；唐君毅，1965；梁濤，2008；黃光國，2018a；張麗珠，2023）。華人諮商師面對宗教價值觀衝突的倫理決策考量可能與西方文化有所差異，是有待探究的本土化諮商議題。

二、華人文化取向雙元倫理觀之倫理決策歷程研究

國內曾對學校輔導與企業諮商的華人諮商師經歷倫理衝突事件的倫理決策經驗進行探究（施丁仁等人，2017；張素惠等人，2019；張素惠等人，2021；謝明瑾、王智弘，2016），研究結果指出：華人諮商師的倫理決策歷程可能會經歷不同的階段，即衝突階段、判斷階段（考慮、行動、結果）與影響階段，並將當事人福祉列為優先考量的重要因素，但此等倫理判斷歷程仍較側重西方重視個人權益的外在規範倫理觀。而田廣曉與王智弘（2020）和程雅好等人（2022）則相對關注於華人文化脈絡在倫理判斷歷程中的重要性，其研究結果指出華人諮商師的倫理判斷歷程確實受到關係取向文化因素影響，中西文化在本質上有其差異性，西方文化偏向個人主義取向，而華人文化則偏向關係主義取向，惟此兩者在倫理決策上皆有其重要性。因此，莊謹鳳等人（2024）進一步以助人倫理雙元模型（王智弘，2016；Wang, 2022）的觀點探究心理師因法院傳喚出庭時的倫理考量，經實徵研究揭示華人諮商師倫理決策思考呈現雙元思維，即華人諮商師的倫理推斷過程是一種兼顧內在良心在與外在規範的倫理「雙元思維」歷程，其中雖涵容西方學者Van Hoose 與 Paradise（1979）五級倫理思考面向（獎懲導向、機構導向、社會導向、個人導向、良心導向），然而華人諮商師的五級倫理思考模式並非為單元向度，而是內外雙元向度，因此莊謹鳳等人（2024）據研究結果而將五級倫理思考分為外、內（左、右）兩個面向，外元三級、內元兩級，亦即「外元」外在客觀理性規範，包括：獎懲導向、機構導向、社會導向列為；而「內元」內在主觀自我修為，包括：個人導向、良心導向。

郭淑梅等人（2024）在探討馬來西亞華人諮商師在諮商過程中遭遇宗教價值觀衝突之倫理議題時，即以莊謹鳳等人（2024）的「心理師出庭之雙元倫理考量模型」作為參考，以文化因素為本土化理論建構之核心，並採宗教價值觀衝突倫理決策為研究主體，整合上述實徵研究之「雙元思維」與「階段性」構念，以進行宗教價值觀倫理決策模型之本土化理論建構。如圖1。

圖1
宗教價值觀衝突倫理決策之雙元模式



註：引自「宗教價值觀衝突倫理決策歷程模式芻議：以馬來西亞多宗教脈絡為例」，郭淑梅、張瑋珊、王智弘，2024，輔導季刊，60（2），66。

此等宗教價值觀衝突倫理決策歷程模式（郭淑梅等人，2024），雖已提出本土化倫理決策模型之理論建構，卻缺乏實徵研究以進行經驗驗證。因此本研究乃以模板分析之質性研究方法以進行含攝文化知識論策略之經驗驗證程序。

三、馬來西亞宗教主體性與制度性權力對諮商實務的影響

馬來西亞多宗教文化脈絡的獨特性在於其多元種族社會之形成，源自歷史上殖民化與移民潮的移動與交織，是經異文化、異種族的融合而形成多宗教脈絡的社會現象

(郭淑梅等人, 2024)。馬來西亞由三大種族所組成, 即馬來人、華人及印度人, 而各族之間保有各自的宗教信仰, 馬來人屬回教, 印度人屬印度教, 馬來西亞華人宗教觀則呈現儒釋道綜攝性的宗教型態(陳秋平, 2020)。馬來人是法定回教徒, 不可信奉他教, 但馬來西亞政府為維護各族和諧與社會安定, 經由法律賦權於華人擁有更大的宗教自由選擇權(Federal Legislation, 2020; Neo, 2006)。華人可自由選擇成為佛教徒、印度教徒、基督教徒、穆斯林教徒或其他信仰(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DSM], 2023)。此等社會氛圍不僅對華人諮商實務發展造成影響(Ng et al., 2021), 也使華人諮商師易於遭遇專業倫理價值觀與宗教價值觀衝突的倫理情境。

馬來諮商師基於受到法定為穆斯林的宗教政策影響, 在諮商取向上必須採回教諮商方式(Ab Rahman et al., 2021), 從而陷入既要維護個人的宗教認同, 卻又需維護助人專業倫理, 引起兩難的倫理困境(Dasti et al., 2020)。而華人諮商師雖可基於宗教自由而自由選擇宗教, 卻也因接觸到不同種族、不同宗教信仰的個案, 面對的宗教價值觀衝突更為多樣, 更可能遭遇具挑戰性的倫理議題(Ting & Ng, 2012)。法定的馬來人宗教限制與華人宗教自由權的差異化現象, 造成馬來西亞華人諮商師在諮商中面對宗教價值觀衝突時的重大倫理困境。

當諮商師遭遇與當事人之間的宗教價值觀衝突, 除須考量宗教信仰的相關法律要求與文化議題之外, 尚須遵守馬來西亞輔導協會(Board of Counselor Malaysia [BCM], 2016)的倫理守則, 即諮商師必須先以遵守國家法規及機構條例規範為最高標準, 其次要考量馬來西亞輔導協會的倫理守則(Ng, 2007), 否則將面對來自馬來西亞1998年第580號法案對註冊諮商師之法律管束(Ahmad et al., 2018), 而可能演變為諮商倫理案件的法律訴訟事件。

馬來西亞在地學者雖對諮商師遭遇宗教價值觀衝突事件提出建議, 主張諮商師應考量個人價值觀、倫理守則和倫理標準(Jaladin & Lau, 2016), 而以維護當事人利益為倫理判斷的考量(Yusoff, 2011), 卻可能因而嚴重違反位於最高標準的國家法規(Ng, 2007), 例如: 當地法律不允許諮商師基於尊重個案意願而支持回教徒改信他教(Ismail et al., 2017)。而當前諮商法令上並無立法承認宗教諮商的專業及其倫理的必要性(Zakaria, 2017), 因此若諮商師涉及宗教價值觀衝突之倫理議題, 在維護當事人權益與須遵守國家法規之間, 可能遭遇巨大的倫理決策風險與個人職涯危機。

宗教是馬來西亞多元文化社會的敏感議題, 而華人的文化獨特性在於既保留儒家文化, 並融入多元宗教經驗, 反映華人諮商師遭遇諮商情境中的宗教價值觀衝突時, 可能面對更為嚴峻的倫理決策挑戰。據此, 借鑒於馬來西亞華人諮商師的多元宗教經

驗而發展一套合乎華人文化的本土化宗教價值觀衝突之倫理決策是有價值的，主要原因在於馬來西亞華人所保有的儒家思維與華人文化根源，與三岸兩地華人的儒家文化是相近的。

綜合上述，本研究採取結合西方與華人文化取向，外在規範與內在良知並重的雙元倫理觀以進行東西方專業倫理理論的整合探討，並以文化權力視角詮釋馬來西亞多宗教文化，揭示宗教主體性與制度性權力對諮商實務的影響，以分析諮商師遭遇宗教價值觀衝突而置身在多宗教脈絡下的倫理判斷歷程，透過實徵研究回應諮商實務現場的文化特殊性考量之需求。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取向

本研究旨在以含攝文化觀點探討諮商師遭遇與當事人宗教價值觀衝突的倫理困境經驗。採質性研究取向的原因在於：質性研究有利於瞭解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對於各種現象經驗（行動、決定、信念、價值觀等）所賦予的意義（Denzin & Lincoln, 2018; Ritchie & Lewis, 2014），強調依據現象進行觀察、詮釋並完成建構（鈕文英，2023），適用於本研究企圖透過理解與詮釋諮商師倫理決策歷程的現象與經驗。本研究立基於質性研究觀點，採黃光國（Hwang, 2019）含攝文化的知識論策略為研究視框，其研究策略整合「結構主義」（高宣揚，2017；Piaget, 1968/2018）、「建構實在論」（Wallner, 1994）以及「先驗實在論」與「批判實在論」（Bhaskar, 2008）之觀點，作為本土諮商心理學理論建構的基礎。「結構主義」認為研究者所建構的理論涉及深層結構內涵，是從各種文化表層結構的差異現象中，經過抽絲剝繭的繁複抽象化過程後，從中找出全人類心理與行為共性的深層結構內涵（高宣揚，2017；黃光國，2011；Piaget, 1968/2018）。「建構實在論」將建構「科學微世界」作為演繹「生活世界」的方法（Wallner, 1994），是心理學本土化理論建構的知識基礎（黃光國，2018b）。而Bhaskar（2008）之「科學發現之邏輯」（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強調運用「先驗實在論」以完成理論模型的想像（建構），再透過「批判實在論」以完成對理論建構的經驗驗證，以證明其真實（王智弘，2023，2024；黃光國，2018b；Hwang, 2019），此為本研究的方法論依據。

綜上，郭淑梅等人（2024）運用含攝文化的知識論策略（Hwang, 2019）完成理論模型之建構（model-building）而產出「宗教價值觀衝突倫理決策之雙元模式」，即為本研究理論建構之「初始模板」。本研究之質性資料分析採取「模板分析」作為分析之策略（張芬芬，2021；Brooks et al., 2015; Crabtree & Miller, 1992; King, 1998; King & Brooks, 2016），其最大特色是充許研究者在先前既有的研究基礎（初始模板）上，採取更具結構的分析策略，在檢視文本之後，可以根據研究主題的特殊需求，對初始模板進行分析並開放靈活的作出適當修改以完成最後模板，此等分析方法相當契合對本土化理論建構進行實徵性經驗驗證的需求（王智弘，2024；王智弘等人，2024）。

二、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以具個人宗教信仰的馬來西亞華人諮商師，於馬來西亞境內執行諮商任務時曾遭遇宗教價值觀衝突事件，並完成倫理判斷歷程與因應策略者為研究參與者。七位研究參與者視其分享意願及資料的豐富度，接受一次約60分鐘的訪談，其個人資料均經模糊處理以保護個人隱私。

表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表

編號	性別	年齡	個人 信仰	機構 信仰	教育背景	服務 年資	訪談 時間	訪談 次數
A	女	37	基督教	基督教	馬來西亞之大學碩士	13年	60分鐘	1次
B	男	68	天主教	基督教	加拿大之大學學士	30年	60分鐘	1次
C	女	38	天主教	基督教	馬來西亞之大學碩士	10年	60分鐘	1次
D	女	40	基督教	基督教	臺灣之大學碩士	15年	60分鐘	1次
E	女	35	佛教	無	臺灣之大學碩士	10年	60分鐘	1次
F	女	37	基督教	基督教	馬來西亞之大學碩士	13年	60分鐘	1次
G	女	53	佛教	佛教	臺灣之大學碩士	30年	60分鐘	1次

三、研究工具

(一) 研究團隊

本研究之第一作者為輔導與諮商博士候選人，具博士層級質性研究與專業倫理課程訓練，以及倫理議題論文發表經驗，曾服務於馬來西亞宗教機構諮商中心，多次經歷諮商師與當事人宗教信仰衝突事件，為研究之主要發想者，質性資料之訪談者與主要分析者，論文主要撰寫者；第二作者為幼兒教育學系教授，同時為輔導與諮商博士生，具質性研究及論文發表經驗，為質性資料分析共同討論者、論文共同撰寫者；第三作者為輔導與諮商博士，具質性研究及倫理議題論文之發表經驗，亦為本研究之協同分析者。

(二) 協同分析者

研究者邀請具模板分析經驗及倫理議題論文發表經驗的輔導與諮商博士擔任本研究的協同分析者，提供多元的研究視角，以加深、加廣對文本不同理解的角度，提高本研究之可信賴度。

(三) 半結構訪談大綱

本研究以半結構訪談進行，訪談大綱是研究團隊依據研究主題進行文獻探討後擬定而成。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保持開放態度，以讓受訪者可以開放地敘述個人宗教價值觀、實務經驗中所遭遇過的宗教價值觀衝突事件與倫理決策過程，以及個人專業反思。

訪談大綱如下：據服務於宗教諮商機構的實務經驗，你認為專業角色與宗教價值觀會有什麼衝突？當你經歷助人專業與宗教價值觀有所衝突時，你是如何處理的？你如何做出倫理決策決定？曾採取過什麼行動？行動結果如何？你經歷助人專業與宗教價值觀衝突後，對你的工作帶來什麼影響？在你的宗教價值觀衝突倫理決策經驗中，你認為在進行倫理判斷過程中，最需要注意什麼？

四、資料蒐集過程

研究者在訪談前，先聯繫受訪者確定時間與地點，以避免訪談過程中之不必要干擾，同時將半結構訪談大綱的題目電郵給受訪者，以加強受訪者對研究目的及訪談內容的理解，使所蒐集的資料可達到完整性。研究者在訪談中，除依訪談大綱題目進行訪談外，並隨著訪談脈絡提出引導問題以協助受訪者更為完整敘述，或持開放態度讓受訪者充分敘述而不作出中斷，以取得更為豐富的訪談資料。訪談後，研究者將錄音

檔謄寫為逐字稿，以電郵方式傳送給受訪者對文本內容的精準性進行確認，獲得受訪者的確認以後始進行資料編碼，輔以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的觀察記錄及反思筆記，以作為模板分析的資料參考。

五、資料分析

本研究資料分析採用模板分析之質性分析策略（張芬芬，2021；Brooks et al., 2015; Crabtree & Miller, 1992; King, 1998; King & Brooks, 2016），取郭淑梅等人（2024）「宗教價值觀衝突倫理決策之雙元模式」為初始模板，以作為分析編碼的依據。首先，採以英文字母與數字作為資料分析的編碼方式，以英文字母代表研究參與者，數字代表訪談段落。如：A-01-001，A代表研究參與者A的訪談，01代表訪談的第一段，001代表訪談段落中的第一小節。形成如表2。

表2

編碼意義與代碼呈現

	第一個編碼	第二個編碼	第三個編碼
編碼意義	研究參與者	段落	小節
代碼	A	01	001

其二為本研究依據「宗教價值觀衝突倫理決策之雙元模式」作為初始模板，研究團隊對初始模板相關定義進行討論，以作為修正模板的依據。經研究團隊共同討論而確認「外在客觀理性規範」意涵概括「獎懲導向」、「機構導向」與「社會導向」。「獎懲導向」指諮商師直覺性感受可能違反規範與受罰；「機構導向」即諮商師基於角色職責清楚知道自己需要遵守之機構規定；「社會導向」是諮商師需服膺於國家律法對諮商專業所制定的法令；「內在主觀自我修為」概括「個人導向」與「良心導向」。「個人導向」是諮商師基於專業倫理自律而為個案最大福祉著想。「良心導向」是諮商師依據內在良心而做出倫理判斷。據此定義為初始模版進行質性編碼系統，對文本進行半開放性的概念化歸類，從最小的意義單元進行文本資料的切割，由下往上的歸類方式，依次為次主題、主題到共同主題，其間檢視初始模板有需要修正之處做出原分類系統的調整。研究者與協同分析者對資料的概念化歸類一致性達 .87 之後，研究團隊針對歸類不一致處進行討論與確認，以減少主觀經驗介入，分析範例如表3。最後則據以文本分析對所採用的初始模板進行適當類目的調整與修訂。據以

完成調整後之最後模版，進行研究結果的撰寫並提出理論建構之實徵驗證的報告。

表3

文本類別—概念過程分析範例

1. 衝突階段之助人專業衝突：諮商師意識到個人宗教取向與專業倫理之衝突

模板類別	共同主題	主題	次主題	意義單元
外在客觀 理性規範	助人專業 衝突	獎懲導向	擔心違反 宗教教義	「我是基督徒，是要跟人家分享福音……可是說在這樣子的工作領域上，有時候我會糾結到底要不要？可不可以？我又不能跟他講。」 (A-18-004)；「我自己內心好像會有點戰戰兢兢。」(A-18-006)
內在主觀 自我修為		個人導向	衡量倫理 守則衝突 點	「其實當你在諮商情景的時候，其實你很想帶他去走向一條尋找正確信仰的路，但是諮商專業是不那麼鼓勵你那麼做的。」(A-17-001)； 「所以就比較多是在於回到來比較多是輔導專業的這一塊。」(A-13-001)

六、研究的可信賴度

King 與 Brooks (2016) 所提出的模板分析對於研究品質的檢驗，是以 Lincoln 與 Guba (1985) 所提之四項質性研究的可信賴度分析為依據，即可信性、可遷移性、可靠性和可驗證性四個評估指標。可信性為確認資料來源的真實性，研究者在訪談過後邀請受訪者參與檢核訪談謄錄稿，確定文字貼近受訪者經驗，以搜集完整、可靠的資料，輔以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的觀察記錄及反思筆記，兼進行三角校正。可遷移性指研究結果在其他情境的適用性，因此研究團隊將研究結果及文獻探討的部分交叉比對進行反覆討論，以文字清楚書寫研究結果及將歷程構圖，讓讀者判斷該模板是否適用於其他情境。可靠性，本研究在進行訪談前沉浸於文獻閱讀以加深對現場的認識與

瞭解，進而擬定符合研究主題的訪談大綱，並在正式訪談前以具有宗教信仰的諮商師作為訪談測試，以對訪談大綱進行修正並貼近受訪者經驗，加強資料的可靠性。可驗證性指研究發現透過研究團隊針對資料分析的反覆討論與確認以達到中立性及客觀性。

七、研究倫理

研究者在投入研究工作時，對研究秉持負責的倫理態度，遵從尊重自主、保護隱私、知情同意、受益、免受傷害、公正、忠實對待之倫理原則（牛格正、王智弘，2021；王智弘，1995，2013；王智弘等人，2014；吳芝儀，2011；Beauchamp, 2011; Robinson & Curry, 2008; 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 [WMA], 2013），以公正、忠實的態度處理文本與質性分析資料，並尊重受訪者自主參與研究意願，經簽署書面同意書以完成知情同意程序，誠實告知研究結果將作為公開性質的學術文章投稿用途，對可能辨識出研究參與者個人資料與隱私部分均予以保密處理，論文發表版本並經研究參與者確認不會有隱私洩漏與任何傷害風險後再進行投稿與發表。

參、研究結果

本研究結果分為三個部分：一為諮商師宗教價值觀衝突倫理決策歷程分析一覽表；二為依據文本資料分析對初始模板進行適當類目調整與修訂的最後模板；三為據最後完成調整後的模板進行研究結果的撰寫。

一、諮商師宗教價值觀衝突倫理決策歷程分析

本研究就文本進行對諮商師宗教價值觀衝突倫理決策歷程的跨個案分析，其分析一覽表，如表4。

續表4

宗教價值觀衝突決策歷程分析一覽表

階段意涵	研究參與者A	研究參與者B	研究參與者C	研究參與者D	研究參與者E	研究參與者F	研究參與者G	
行動階段： 中止／轉介	A 不因宗教價值衝突而轉介。	B 認為不能因宗教價值衝突而做出轉介。	C 不能因宗教價值衝突而轉介。	D 不以宗教價值觀差異轉介。	E 認為不應予以中止或轉介。	F 不曾因宗教價值衝突而轉介。	G 不曾將個案轉介或中止。	
影響階段： 反思倫理專業與宗教價值觀	A 反思後以專業為本，需對個案進行全神貫注，相信個案中，相對於專業，我需從中學習，並不斷進行自我修練。	B 反思後，我對個案的處理，是基於專業與倫理的考量，而非個人的情感。我對個案的處理，是基於專業與倫理的考量，而非個人的情感。	C 反思後，我對個案的處理，是基於專業與倫理的考量，而非個人的情感。我對個案的處理，是基於專業與倫理的考量，而非個人的情感。	D 反思後，我對個案的處理，是基於專業與倫理的考量，而非個人的情感。我對個案的處理，是基於專業與倫理的考量，而非個人的情感。	E 反思後，我對個案的處理，是基於專業與倫理的考量，而非個人的情感。我對個案的處理，是基於專業與倫理的考量，而非個人的情感。	F 反思後，我對個案的處理，是基於專業與倫理的考量，而非個人的情感。我對個案的處理，是基於專業與倫理的考量，而非個人的情感。	G 反思後，我對個案的處理，是基於專業與倫理的考量，而非個人的情感。我對個案的處理，是基於專業與倫理的考量，而非個人的情感。	G 反思後，我對個案的處理，是基於專業與倫理的考量，而非個人的情感。我對個案的處理，是基於專業與倫理的考量，而非個人的情感。

二、依據文本資料分析對初始模板進行類目調整與修訂而形成最後模板

本研究採模板分析作為資料分析方法，選取適合用於本研究目的之模板，即郭淑梅等人（2024）「宗教價值觀衝突倫理決策雙元模式」，透過實徵研究所取得的文本分析進行模板調整、修正而完成最後模板的建構。主要對倫理決策歷程與主軸倫理考量作出調整：一為將倫理決策歷程三階段修正為四階段；二為倫理決策歷程主軸考量之修正。

（一）初始模板之倫理決策歷程三階段修正為四階段

研究團隊於資料分析過程對初始模板相關定義重複討論，以獲得對定義深度理解與掌握，作為研究團隊修正模板的精準依據。而經文本資料分析以後揭示諮商師倫理決策歷程可以分為四個階段，與初始模板原呈現倫理決策歷程三個階段，即衝突、判斷與影響階段有所不同，因此加以調整。實徵研究發現諮商師在遭遇宗教價值觀衝突時，會選擇與機構督導討論後，方始會採取倫理決策行動，是先有「判斷」後有「行動」兩個過程，因此對初始模板進行修正。因此，本研究將初始模板的衝突、判斷與影響之三個階段，修改為衝突、判斷、行動與影響四個階段歷程。

（二）倫理決策歷程主軸考量之四項修正

初始模板顯示倫理決策主軸考量包括：「接案程序」、「知情同意」與「諮商目標」做為「決策行動」的倫理推斷。而經本研究文本分析發現諮商師遭遇與當事人宗教差異時，直接浮現反應為一方面需遵守專業倫理，卻同時擔心自己違反宗教教義，而引起諮商師的宗教價值觀與倫理專業的衝突。經由研究團隊討論，將初始模板主軸一「接案程序」修正為「助人專業衝突」，並將其原「考量多宗教情境脈絡」修正為「宗教教義考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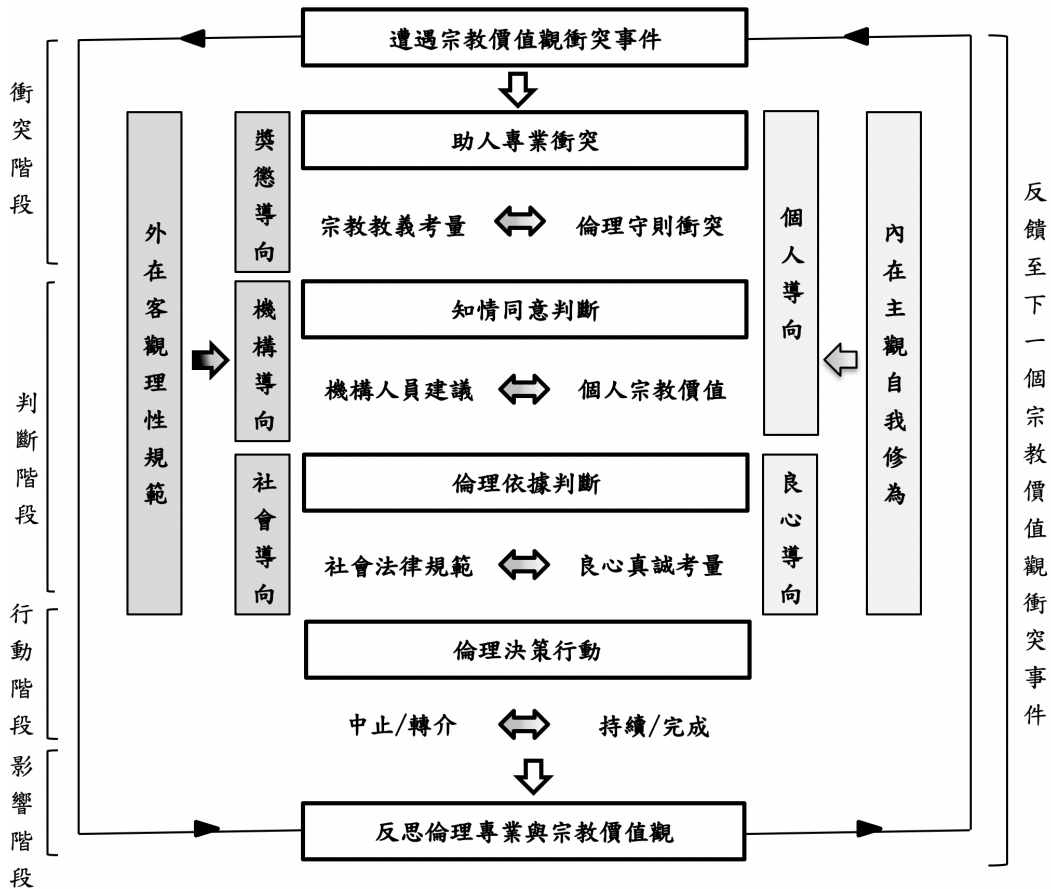
初始模板的主軸二「知情同意」，原主張諮商師與當事人需了解、釐清雙方宗教價值觀。但本研究文本分析揭示諮商師置身於宗教價值觀衝突情境時，已清楚知道當事人的宗教價值觀為何。更多的考量來自於諮商師處理違反宗教教義的諮商議題時，評估應如何維護當事人最大權益而自覺有需要澄清個人宗教價值觀，因此選擇與諮商機構的督導或宗教機構的神職人員進行討論及徵求專業意見。因此經由研究團隊討論，將初始模板主軸二「知情同意」之「了解個案宗教價值觀」修正為「知情同意判斷」之「機構人員建議」。

初始模板的主軸三為「諮商目標」，經由本研究團隊據文本分析所得而討論，一致認為主軸三非為諮商師對諮商目標的考量，而是諮商師依據內在良心對倫理依據

做出推論，最後形成諮商師的倫理依據判斷，因此將主軸三修正為「倫理依據判斷」。

此外，經研究團隊討論各主軸核心議題的文字精煉化，同意將「擔心違返宗教之教義」改為「宗教 義考量」；「衡量倫理守則衝突點」改為「倫理守則衝突」；「諮詢機構人員之建議」改為「機構人員建議」；「澄清助人者宗教價值觀」改為「個人宗教價值」；「考慮社會與法律規範」改為「社會法律規範」；「出自於良心真誠考量」改為「良心真誠考量」；「中止諮商以進行轉介」改為「中止／轉介」與「持續進行以完成諮商」為「持續／完成」。據以上四項修正，完成「宗教價值觀衝突倫理決策之雙元模式」新模板，如圖2。

圖2
宗教價值觀衝突倫理決策之雙元模式



三、本研究據最後模板進行研究結果的整體詮釋

(一) 階段一「衝突」：意識到宗教教義要求與專業倫理自律產生衝突

初始模板僅將「遭遇宗教價值觀衝突事件」列為衝突階段。研究發現具宗教信仰的諮商師置身於多宗教脈絡社會的諮商情境，遭遇價值觀衝突事件後，首先直覺性地浮現因與個案宗教差異而帶來可能違背宗教教義的擔憂與不安（左面／懲導向）；內心卻又隱約浮起一切應以當事人福祉為考量的倫理自律（右面／個人導向），即內在主觀自我修為，呈現諮商師外在宗教教義要求與內在專業倫理自律的內外衝突。因此，新模板將「助人專業衝突」也歸為衝突階段，其衝突呈現雙元思維：外在客觀理性規範（左面／懲導向）的擔心違反宗教之教義與內在主觀自我修為（右面／個人導向）的衡量倫理守則衝突點。

比如C受「外在獎懲導向」思維影響而擔心違反教義：「會不確定就是說，因為在天主教來說，就可能不太能夠接受同志的這樣子的一個性傾向。所以其實當時就會有一些混亂」（C-02-002）、「就好像做著不對的事情」（C-03-002），但C另一方面又受「內在個人導向」思維影響而擔心會損及當事人福祉：「我覺得我站在專業的立場的話，我是嘗試就不去帶著就是說宗教的這個價值觀在這個工作裡面。」（C-02-003）

又比如F受「外在獎懲導向」思維影響而擔心違反教義：「在我的整個輔導過程當中，有時候我也是會覺得說，就是他們做的這個事情跟我的信仰也是違背的」（F-07-001）、「可是我就會問我自己對嗎？應該嗎？好嗎？」（F-10-004）；但F另一方面又受「內在個人導向」思維影響而擔心會損及當事人福祉：「所以我不是來指控他的。……我們在輔導個案的時候不灌輸任何的宗教觀念，可是我們自己本身有我們自己的宗教觀念。」（F-02-003）

因此，諮商師在「助人專業衝突」會經歷同時衡量擔心違反教義的「外在獎懲導向」思維以及擔心會損及當事人福祉的「內在個人導向」思維之間的倫理衝突。

(二) 階段二主軸「判斷」：共有兩個主軸形成

第一判斷主軸為「知情同意判斷」：諮商師意識到宗教價值觀衝突事件後，一方面尋求外在環境如機構督導、同儕或神職人員的建議，以確立機構的立場與要求（左面／機構導向）；一方面進行自我內在宗教價值觀的澄清，以對當事人做出符合倫理守則的知情同意，以避免強加個人宗教價值觀於個案身上而傷害當事人福祉（右面／個人導向），如修正後模板的雙元思維：「知情同意判斷」之外在客觀理性規範（左

面／機構導向)的「諮詢機構人員之建議」與內在主觀自我修為(右面／個人導向)的「澄清助人者宗教價值」。

比如D在面對宗教價值觀衝突的倫理困境時，一方面受「外在機構導向」影響而希望合乎機構期待：「我再去找我的督導去瞭解」(D-04-002)、「我的督導也是基督徒。嗯，在這個信仰上面的話呢，他會指導我，就是讓我去看到說，哎，這個部分是怎麼樣啊！……我好像就是有一個人帶領著，就是帶著我這樣子吧！」(D-08-001)，但D另一方面又受「內在個人導向」倫理自律的思維影響而擔心會損及當事人福祉，因此進行自我個人內在宗教價值觀的澄清，並對做案做出知情同意判斷：「我揭露我自己的宗教信仰，我也理解你的宗教信仰是什麼，這樣對我們的諮商是有幫助，對當事人才有維護他們的最大的權益的。」(D-13-002)

第二判斷主軸為「倫理依據判斷」：諮商師進行考量社會法律規範以及內在良心之間的衡量以做出倫理判斷。諮商師一方面要考慮到外在社會與法律規範的要求以及應付法律責任以免受到法規制裁，一方面又要秉持內在良心以做出合乎良心的行為以免內在良心不安，即要同時衡量外在客觀理性規範(左面／社會導向)以及內在主觀自我修為(右面／良心導向)。

比如A一方面基於需要遵守社會與法律規範對宗教立法的限制，而考量需遵守國家立法賦於各種族的宗教自由權，而迴避此一馬來西亞政治上敏感的宗教議題：「我不會跟他們談起宗教，或者是這些的課題。除非他們自己想談。」(A-13-002)；一方面又基於內在道德良心的考量，真誠的從維護當事人福祉的角度去思維，而非依循個人的宗教立場與法律規範：「我是一個諮商師的角度、position這一邊。我不可以特別去強調神。」(A-19-002)、「然後他們有提到關於一些宗教背景是怎麼支持他現在的處境的話，我還是回到他當下的一些感受。」(A-12-002)

綜上，當諮商師進行倫理依據判斷時，會同時考量外在客觀理性規範：先直覺考量是否會受到處罰，然後考慮機構的期待，而後是社會與法律的規範；又同時考量內在主觀自我修為：先考量身為專業人員的倫理自律，而後是個人內在道德良心的真誠考量，在內外雙元同時考量之下做出最合宜的倫理判斷。

(三) 階段三「行動階段」：諮商師經歷倫理判斷以後，則思考中止、轉介或持續諮商作為適當的「倫理決策行動」

本研究以文本分析發現，諮商師雖可以中止或轉介的方式來處理宗教價值觀衝突的議題，但華人諮商師在面對宗教價值觀衝突議題時，較少採取中止或轉介，而是會

持續提供諮商服務。初始模板並沒有將階段三「行動階段」單獨列出，但研究發現當諮商師面對與自己宗教價值觀衝突的當事人，在同時考慮外在客觀理性規範的直覺獎勵後果、機構期待、社會及法律規範，以及內在主觀自我修為的倫理自律與道德良心之後，決定採取中止諮商並轉介，或者持續諮商的行動決策以做出最佳的「倫理決策行動」，其背後的考慮有多個面向，值得更仔細的討論。

C即表示：「我不會因為宗教價值觀衝突的議題，然後我選擇中斷，好像很少會聽到有這樣的一個決定。」(C-12-003)、「一般我本人不會做這個決定。」(C-12-004)。A也採取同樣的作法：「曾經有過轉介或中止服務的想法。」(A-21-001)、「但都不是因為宗教衝突」(A-21-009)。B也表示不會拒絕宗教價值觀衝突的個案：「如果你是這樣的信仰，與我的信仰有衝突，那麼我就不接你這個個案。我不會這樣做的(中止)。」(B-13-002)

華人諮商師會傾向於做出上述的倫理決策，最主要是基於諮商師內在的倫理專業自律與道德良心的緣故，其中的專業考量點包括：「以人為本」、「無條件接納」、「對個案負責與忠誠」而採取持續進行諮商的倫理決策行動：

以人為本：A就表示：「對我來講，我的出發點就是還是以人為本。」(A-12-001)、「就至少還是會盡力的，還是會持續，還是會選擇持續。」(A-20-002)。F也主張：「我始終還是回到人本的角度繼續諮商，就是現在，我在這裡，我是聽你說」(F-21-001)、「你當然可以說任何東西。」(F-21-002)。

無條件接納：B表示其維持繼續諮商的理由：「我還是完全的從諮商專業的態度去接納他，然後再去聽他所說的。」(B-13-002)。D也是秉持接納的角度來持續提供諮商服務：「發現到說其實我沒有拒絕的時候」(D-11-002)、「其實當我們不要太快去中止個案不談，我們反而是先去接納他。」(D-11-003)。

對個案負責與忠誠：D即表示是基於負責的態度：「那過程當中，其實當我用這個輔導的專業跟責任去跟個案談的時候，其實是可以談的。」(D-11-006)。E也是基於負責與忠誠的理由持續提供諮商服務：「沒有中止，是因為他只要就是我的個案。我對他是有責任的，必須忠誠於我的個案。所以我能做的就是盡我們所能的，依我們在這一方面的經驗去跟他做解釋」(E-07-001)、「我們還是會尊重他。」(E-07-002)

綜合華人諮商師在考量是否中止並轉介或持續提供諮商的倫理決策行動時，較少基於避免犯錯而轉介個案，較多傾向基於「以人為本」、「無條件接納」、「對個案負責與忠誠」之內在倫理自律與道德良心，持續提供諮商，雖然可能有價值觀強加的

風險，但轉介個案則因有道德良心上不能拋棄個案的考量而選擇維持現狀。

（四）階段四「影響階段」：形成新的倫理立場與反思

諮商師完整經歷宗教價值觀衝突倫理決策歷程後而形成專業倫理新立場與宗教價值觀新反思，反饋至下一個宗教價值觀衝突事件：

專業倫理新立場：華人諮商師在經歷宗教價值觀衝突之後可能會產生新的助人專業倫理態度，包括提升自我知能及增進自我覺察。（1）提升自我知能以增強因應能力：比如A就體認到「其實你在這個領域上，有些時候你要不斷的去，叫什麼增值啊！自我增值！自我增值！嘗試去了解，去了解，就是各樣專業知識。」（A-28-001）。G也認為「技巧還是有它的重要的地方。basic skill。」（G-12-004）；（2）增進自我覺察以調整適切心態：G就提及「因為助人者一個很重要的，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自我覺察。」（G-10-004）。A也體認到「照顧自己這個部分……它會影響你的專業，它會影響你個人的狀態，所以自己照顧，還是要很重要。」（A-28-005）。C也提及「我覺得在專業上面最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宗教價值觀）內心的矛盾」（C-11-001）。D也認為「我就是覺得我要抱著一個很彈性和多元的角度和接納態度去看待宗教信仰和個案吧！」（D-07-002）

宗教價值觀新反思：包括個人人生觀的改變、機構宗教立場的理解以及宗教影響力的覺知。（1）個人人生觀的反思：E就有特別的生命領悟：「我覺得那是一種生命的……會碰觸到你的是一種生命跟內在的吶喊。」（E-08-001）、「內在那一種對生命的那一種觸動，你看到了他對於生命的那一種苦」（E-08-002）。G也反思到自身的修為：「我面對跟個案有衝突，面對這個佛教講的生命苦難的時候，我更多的是回到我自己的自我修行。」（G-11-001）；（2）機構宗教立場的理解：F就反思到「我個人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先了解自己服事的那個機構（是否具有宗教色彩）」（F-22-001）；（3）宗教影響力的覺知：A就認為：「所以我們就常說我們在服務人的時候，有些時候我們的能力有限，可是就不要忘記神，其實神也在過程裡面，神在參與。」（A-25-002）。B也表示「如果要做這件事情要做得好。一定要回到自己（內在）對自己的信仰認識。」（B-34-005）。D也提及「先跟個案接觸。也許在這個過程當中，上帝有祂的美意啊，就是讓你接到這個個案，一定有他的原因在裡面」（D-11-007）。G也認為「就是如果宗教可以讓人改變，或成為力量。其實這種宗教價值觀在諮商情境是可以被允許，跟帶來能量……就能夠跟案主同在。」（G-15-006）

諮商師因遭遇宗教價值觀與專業倫理衝突事件，而完成宗教價值衝突倫理決策歷程，並形成專業倫理新立場與宗教價值觀新反思。此反思反饋至下一個宗教價值觀衝突事件，而產生了專業倫理新立場以要求自己提升自我知能及增進自我覺察，也有了宗教價值觀的新反思，而產生了個人人生觀的改變、對機構宗教立場的理解以及對宗教影響力的覺知。

肆、討論與建議

一、華人文化與西方文化倫理思考的差異

西方道德發展理論所推崇的Kohlberg道德發展，反映西方個人主義、理性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正義（justice）思維（Shweder, 1982），但也被認為存有文化偏見（McLeod, 2013）。國內學者則對於Kohlberg道德判斷由下往上之線性認知發展持有不同意見，外加其階段六的道德推理方式缺乏實徵資料的證實（黃光國，1998，2009；葉紹國，1996），只能被認為是假設性的結構（Kohlberg, 1984）。華人學者們則認為Kohlberg道德發展忽略情義與感性層面的考量（馬慶強，1998；陳舜文、邱振訓，2011；葉紹國，1997），而文化價值觀對道德判斷歷程影響深遠（陳舜文、邱振訓，2011），顯示不同情境與文化需列為道德倫理判斷的核心考量。

據此，不少華人學者基於華人文化道德思想而質疑Kohlberg道德推理是否適用於解析華人的道德判斷（馬慶強，1998；黃光國，1998；葉紹國，1996），尤其儒學思考模式是一種內外兼顧反求諸己的內在反思模式（黃光國，2010），強調個人道德良知屬自覺性的內在自律，而非由外在他律而構成，更不是高度認知發展的產物（唐君毅，1965）。王智弘（2016）以儒學「仁」的觀點作為「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式」的知識論，主張諮商師面對專業倫理的約束力，並非只來自於外在環境的規範如守則、條規或要求等，而是會同時基於華人諮商師本自俱足的道德良心所形成之道德自律性，體現儒學之孟子心性論所主張的道德自覺，是一種道德意識內在論（梁濤，2008），即「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的良知良能（張麗珠，2023），與Kohlberg道德發展所持有的道德判斷是可經由學習的社會文化規範內化歷程有所差異。

諮商領域專業倫理普遍採Van Hoose 與 Paradise（1979）據Kohlberg由下往上的道德發展論而建立的「五級倫理思考模式」，其理論主張一個人的倫理思考可分為五

級，依次為第一級「獎懲導向」、第二級「機構導向」、第三級「社會導向」、第四級「個人導向」到第五級「原則與良心導向」，是依循Kohlberg道德發展論判斷階層乃漸次上升的倫理思考模式；而莊謹鳳等人（2024）於華人倫理考量的實徵研究結果，揭示華人諮商師的倫理判斷歷程迥異於Van Hoose與Paradise漸次上升的五級倫理思維模式，而是符合王智弘（2018）「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式」的內外雙元模式，即同時兼具「外元」與「內元」倫理思維模式。外元的倫理思考包括第一級獎懲導向、第二級機構導向與第三級社會導向，是為外在客觀理性規範，而內元的倫理思考包括第四級個人導向與第五級良心導向，是為內在主觀自我修為，而倫理判斷係為外在與內在同時考量之雙元辯證思維歷程。

西方學者如Corey等人（2019）亦曾指出倫理決策非純粹認知取向，或以清楚步驟化的線性過程作為解決倫理困境的方法。線性模型的倫理決策只能成為諮商師專業倫理準則的定位和倫理決策的基礎，但無法成為實踐指南（Levitt et al., 2015）。莊謹鳳等人（2024）據紮根理論形成的研究結果，證實單向度之線性五級倫理思考模式無法充份說明華人文化觀點的倫理思維，因此將其修正為外在之「獎懲導向」、「機構導向」與「社會導向」，以及內在之「個人導向」與「良心導向」之雙元模型，本研究參考莊謹鳳等人（2024）之研究理路，以含攝華人文化之觀點詮釋華人諮商師進行倫理決策歷程中之「內元思維」，其中包括諮商師的倫理自律以及道德良心的自我要求，由於Van Hoose 與 Paradise（1979）「五級倫理思考模式」對第四級「個人導向」的詮釋只強調諮商師對當事人個人權益的維護，從莊謹鳳等人（2024）與本研究的結果顯示，以倫理雙元模型的觀點而言，「個人導向」的倫理思維不只是著眼於當事人個人權益的維護，更重要的是諮商師倫理自律的自我要求，所以其不只是「個人導向」而且是「自律導向」的倫理思維；其次是Van Hoose 與 Paradise（1979）「五級倫理思考模式」對第五級「原則與良心導向」的詮釋強調此一導向強調諮商師的倫理意識與良心原則，惟「原則」一詞的用語易使人意指為當事人五大權益的概念，因此以「良心導向」之用語應更為適切，而「個人導向」的倫理自律以及「良心導向」的道德良心正是諮商師「內在主觀自我修為」的重要操作內涵。本研究結果指出華人諮商師在面對宗教價值觀倫理衝突時，會同時考量「獎懲導向」、「機構導向」與「社會導向」之「外在理性客觀規範」，以及「個人導向」與「良心導向」之「內在主觀自我修為」，而形成「外元」與「內元」的雙元倫理之辯證思維與權衡。

二、馬來西亞華人文化與多宗教脈絡交織而成的多元價值觀

以馬來西亞多元文化而言，各種不同宗教信仰體系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形成多宗教脈絡。各種族為維護自己的種族、文化和宗教信仰而演化為共融及和諧的社會互動模式（Abdul Rahman & Mohd Khambali, 2013; Abubakar, 2013），在漸進化歷史發展過程中互相適應、協調而養成各種族之間的宗教容（religious tolerance）（Abdul Ghani & Awang, 2017），多元種族之間蘊育共同理解（understanding）、容（tolerance）和接受（acceptance）的宗教素養（Awang et al., 2022; Yew et al., 2021），融合於華人諮商師的專業素養。由於人們的道德價值觀常來自於宗教價值觀，而和諧（tolerance）與容（harmony）皆為多元文化價值觀中最為普遍的道德價值（Meyer, 2023）。華人諮商師身處多元文化的社會環境，意識到社會文化發展過程中自然形成且相互涵容的社會價值觀，並保持覺察、開放的心態，以「價值中立」面對宗教價值觀衝突的倫理決策，以因應社會上普遍可接受的正規價值。因此在雙元之「內元倫理」所主張的內在良知，其倫理推論歷程隱含多元社會共同價值觀的「共同理解」、「容」及「接受」，並將宗教教價觀所推崇的「愛」、與「慈悲」內化為良心，以呈現宗教教義與文化傳統會通的價值觀，顯示馬來西亞華人諮商師面對多宗教價值觀衝突的諮商議題時，可望採取廣的多元文化觀以超越狹隘的個人宗教價值觀。

而本研究所採取黃光國（2014）「含攝文化理論的知識論策略」觀點，並融合文化心理學家Shweder等人（1998）提出的「一種心智，多種心態」（one mind, many mentalities）之原則，認為人類經驗可反映其共同心智，亦可說明特定文化中人們的特殊心態，並可以此觀點建立普世性的理論。此即本研究所依循之本土諮商心理學的含攝文化觀點，要發展本土的諮商理論可同時涵容本土文化與世界文化思想發展的成果，以完成中西會通的創造性詮釋，並經在地化的實徵資料加以驗證（王智弘，2013，2023）。

綜合本研究之質性資料「模板分析」結果，可確認「宗教價值觀衝突倫理決策之雙元模式」獲得實徵資料之驗證，以完成「批判實在論」所主張理論建構的經驗驗證程序，以證明其真實（王智弘，2023，2024；王智弘等人，2024；黃光國，2018b；Hwang, 2019），而可作為後續宗教價值觀衝突倫理決策之研究與實務工作之參考，此為本研究最重要之貢獻。

三、結論

馬來西亞華人諮商師與當事人宗教價值觀衝突倫理決策歷程，會呈現「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型」（王智弘，2018；Wang, 2022）所主張之「外在理性客觀規範」與「內在主觀自我修為」的雙元倫理考量。

宗教價值觀衝突倫理決策雙元模式經模板修正後完成模型建構，說明宗教價值觀衝突倫理決策過程會經歷「助人專業衝突」、「知情同意判斷」、「倫理依據判斷」與「倫理行動決策」等四階段的倫理考量。

本研究自華人諮商師與當事人宗教價值觀衝突之倫理判斷歷程的分析，再次驗證倫理判斷之本質較符合莊謹鳳等人（2024）所主張係為內、外向同時考量之雙元（雙向度）辯證思維歷程，而非Van Hoose 與 Paradise（1979）依據Kohlberg（1958）以認知發展觀所建立之道德發展論，而主張之單元（單向度）認知發展思維歷程。

本研究發現華人諮商師面對宗教價值觀衝突，並非以宗教價值觀作為倫理決策，傾向探索個人所處的文化處境背後所蘊含著一套多元文化價值觀之普世價值。

四、建議

根據以上研究結果的分析及討論，對諮商師提出專業倫理建議。

（一）應釐清個人對宗教教義的理解，並考慮表明個人宗教價值觀之適切性

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宗教價值觀衝突倫理決策之雙元模式」之新模板。研究發現諮商師面對宗教價值觀衝突事件時，會釐清宗教教義與倫理規範的衝突，但較少對當事人揭露諮商師個人的宗教價值觀。是否揭露的主要考量應是能否為個案帶來益處（Mitchell, 2022）。因此，建議諮商師是否對當事人澄清個人之宗教價值觀，應考慮此舉是否能增進諮商關係、改善諮商歷程，或對當事人是否有助益。

（二）馬來西亞華人諮商師之實務建議：發展宗教敏感度與倫理對話能力

馬來西亞為多宗教社會，宗教信仰深植於人民日常，宗教敏感性已成為一種文化常態（Kamarzaman et al., 2024）。本研究顯示，馬來西亞華人諮商師在面對宗教價值觀衝突時，傾向採用雙元倫理思維模式，融合外在專業規範與內在道德信念，並常主動與督導、同儕或宗教權威進行討論，以釐清信念界線、避免誤觸法律或宗教禁忌。特別是督導在倫理決策中具有關鍵影響力，透過督導歷程中開放性的宗教議題對話，有助於諮商師保持正向心態與專業覺察（Garner et al., 2017）。因此，建議馬來西亞華人諮商師持續強化宗教敏感度、文化覺察與倫理判斷能力，並落實「預防衝突、尊

重差異、尋求理解」的跨宗教助人原則（Abdul Rahman & Mohd Khambali, 2013），以回應多元宗教文化下的專業挑戰，同時守護當事人之福祉。

五、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首先，本研究限制為研究受訪者皆為「經歷衝突但無轉介個案」型態，而研究結果亦顯示諮商師在實務中因信仰忠誠與專業倫理衝突而產生深層內在掙扎，卻仍選擇不轉介案主，顯示其決策非建立在制度標準上，而是依賴個人良心修為與文化處境作出判斷。因此，未來研究可納入「曾考慮／或實際轉介個案」的受訪者態樣，以擴充本研究的廣度與深度，以發展更具操作性的倫理推斷策略，包括實務演練、文化情境模擬與情緒調節支持機制，以提昇諮商師在倫理決策中可同時兼顧普世價值與文化特殊性。

其次，本研究對象以馬來西亞華人為例，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者傾向以個人道德良知作與專業自律調節宗教衝突，而缺乏對自身處於權力不對等宗教結構位置之批判性反思，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探究諮商師如何在回教主導結構下的「語言管理」、「議題選擇」和「角色調適」的思考模式，以補足本研究在制度性壓力與文化權力交織下倫理實踐樣貌的詮釋不足。

最後，本研究中接受諮商的個案，其宗教信仰背景僅間接出現在受訪諮商師的敘述中。諮商師與其個案雙方的宗教信仰配對組合類型，可能帶來不同形式的價值觀衝突，本研究受限於資料，無法探究此議題。未來研究方向可彙整與統合雙方宗教信仰背景，以更深化理解雙方宗教價值觀衝突的類型分類，如佛教諮商師與基督徒案主，基督教諮商師與同志議題案主等，作為加強說明文化多元對倫理衝突決策的影響，以期更具說服力說明宗教價值觀差異如何實質影響判斷與倫理決策。

參考文獻

- 牛格正、王智弘（2021）。助人專業倫理。心靈工坊。[Niu, G.-Z., & Wang, C.-H. (2021). *Helping professional ethics*. PsyGarden.]
- 王智弘（1995）。個別諮商過程中涉及的倫理問題。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學報，**18**，191-222。[Wang, C.-H. (1995). The ethical issues in individual counseling. *Guidance Journal*, *18*, 191-222.]
- 王智弘（2013）。從文化理解到含攝文化理論之建構：從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型到研究倫理雙元模型。臺灣心理諮商季刊，**5**（4），vi-xii。[Wang, C.-H. (2013). From culture understanding to culture-inclusive theory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 Duality Model, from helping professional ethics to research ethics.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5(4), vi-xii.]
- 王智弘 (2016)。含攝儒家功夫論的本土專業倫理觀：從助人倫理雙元模型談儒家的倫理自我修為之道。臺灣心理諮商季刊，8 (2)，vi-xii。[Wang, C.-H. (2016). Indigenous view of Confucius culture-inclusive profession ethics: From the Duality Model of helping professional ethics to Confucius way of ethical self-cultivation.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8(2), vi-xii.]
- 王智弘 (2018)。諮商倫理議題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載於蕭文、田秀蘭 (主編)，臺灣輔導一甲子 (337-370頁)。心理。[Wang, C.-H. (2018).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counseling ethics issues. In W. Hsiao & H. L. Tien (Eds.), *Sixty years of counseling in Taiwan* (pp. 335-368). Psychological Publishing.]
- 王智弘 (2023)。本土諮商心理學與本土社會科學的可能研究路徑與研究方法論。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14 (4)，vi-xxxvii。[Wang, C.-H. (2023). Possible research paths and methodology for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and indigenous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14(4), vi-xxxvii.]
- 王智弘 (2024)。黃光國老師創造的文化資產：中華本土社會科學會與含攝文化的知識論策略。中華本土社會科學期刊，5，31-44。[Wang, C.-H. (2024). Cultural assets from teacher Kwang-Kuo Hwang: The Chinese Indigenous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d the epistemological strategy for constructing 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 *Journal of Chinese Indigenous Social Science*, 5, 31-44. [https://doi.org/10.30213/JCISS.202412_\(5\).0003](https://doi.org/10.30213/JCISS.202412_(5).0003)]
- 王智弘、劉淑慧、張勻銘、楊淳斐、鄧志平 (2014)。心理諮商研究倫理守則建置之意見調查研究。教育心理學報，46 (1)，51-72。[Wang, C.-H., Liu, S.-H., Chang, Y.-M., Deng, C.-P., & Yang, C.-F. (2014). A survey of counseling research ethics code building.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6(1), 51-72.]
- 王智弘、嚴嘉琪、夏允中 (2024)。諮商心理學的在地化與本土化。本土諮商心理學刊，15 (4)，vi-xxv。[Wang, C.-H., Yan, J.-C., & Shiah, Y.-J. (2024). Localization and indigenization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15(4), vi-xxv.]
- 田廣曉、王智弘 (2020)。大陸地區大學諮商師涉及雙重關係倫理議題之本土化探討。本土心理學研究，54，113-176。[Tian, G.-S., & Wang, C.-H. (2020). An indigenous study of the dual relationship ethical issues encountered by university counselors in China.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54, 113-176. [https://doi.org/10.6254/IPRCS.202012_\(54\).0003](https://doi.org/10.6254/IPRCS.202012_(54).0003)]

- 吳芝儀 (2011)。以人為主體之社會科學研究倫理議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5 (4)，19-39。[Wu, C.-Y. (2011). Ethical issue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volving human participant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5(4), 19-39. [https://doi.org/10.6284/NPUSTHSSR.2011.5\(4\)2](https://doi.org/10.6284/NPUSTHSSR.2011.5(4)2)]
- 施丁仁、陳源滄、王智弘 (2017)。員工協助方案提供企業諮商服務過程中涉及雙重關係倫理議題之探討。輔導與諮商學報，39 (2)，55-77。[Shih, T.-J., Chen, Y.-C., & Wang, C.-H. (2017). The ethical issue over dual relationship in the workplace counseling service offered by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The Journal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39(2), 55-77.]
- 唐君毅 (1965)。道德自我之建立。現代學苑，2 (6)，39-40。[Tang, J.-Y. (1965).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ral-Self in the Confucian concept. *Universitas: Monthl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2(6), 39-40. <https://doi.org/10.7065/MRAS.196509.0014>]
- 馬慶強 (1998)。儒家倫理與西方道德：情義難兩全。本土心理學研究，9，205-216。[Ma, H.-K. (1998). Confucian ethics and western morality: The affection and justice dilemma in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9, 205-216. [https://doi.org/10.6254/IPRCS.199806_\(9\).0006](https://doi.org/10.6254/IPRCS.199806_(9).0006)]
- 高宣揚 (2017)。結構主義。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Gao, X.-Y. (2017). *Structuralism*.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 梁濤 (2008)。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Liang, T. (2008). *Gua Dian Zhu Jian and the thought of Shi Me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 莊謹鳳、張素惠、程雅好、陳美伊、王智弘 (2024)。心理師作為證人之本土化探討：性侵害議題出庭作證之倫理考量。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70，37-74。[Chuang, J.-F., Chang, S.-H., Cheng, T.-Y., Chen, M.-I., & Wang, C.-H. (2024). Indigenous study of psychologists as witnesses: Ethical considerations of testifying in court on sexual assault issues.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70, 37-74. <https://doi.org/10.53106/172851862024050070002>]
- 郭淑梅、張瑋珊、王智弘 (2024)。宗教價值觀衝突倫理決策歷程模式芻議：以馬來西亞多宗教脈絡為例。輔導季刊，60 (2)，57-76。[Koay, S.-M., Chang, W.-S., & Wang, C.-H. (2024). The primary discussion of ethic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model of religious values conflicts: A study of Malaysia in a multi-religious context. *Guidance Quarterly*, 60(2), 57-76.]
- 陳秉華、黃奕暉、范嵐欣 (2018)。融入宗教／靈性的心理諮商在臺灣：回顧與展望。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53，45-80。[Chen, P.-H., Huang, Y.-H., & Fan, L.-H.]

- (2018). Religiously/spiritually integrated counseling in Taiwan - Reviews and future directions.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53, 45-80. <https://doi.org/10.3966/172851862018100053003>]
- 陳秋平 (2020)。「知識佛教」與馬來西亞華人佛教的轉型。人間佛教研究，10，180-207。[Tang, C.-P. (2020). Intellectual Buddh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Buddhism in Malaysia. *Studies in Humanistic Buddhism*, 10, 180-207.]
- 陳舜文、邱振訓 (2011)。道德判斷的「雙重歷程模式」：認知、情緒與文化的整合觀點。本土心理學研究，36，33-76。[Chen, S.-W., & Chiu, C.-H. (2011). The dual-process model of moral judgment: An integrated viewpoint of cognition, emotion, and culture.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36, 33-76. <https://doi.org/10.6254/2011.36.33>]
- 張芬芬 (2021)。質性研究進階探索：換一副透鏡看世界。五南。[Chang, F.-F. (2021). *Higher exploration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ld through a different lens*. Wunan.]
- 張素惠、莊謹鳳、王智弘 (2019)。員工協助方案人員面對保密議題之倫理判斷歷程研究。教育心理學報，51 (2)，231-255。[Chang, S.-H., Chuang, J.-F., & Wang, C.-H. (2019). Ethical judgment process for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 professionals on confidentiality issue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51(2), 231-235. [https://doi.org/10.6251/BEP.201912_51\(2\).0003](https://doi.org/10.6251/BEP.201912_51(2).0003)]
- 張素惠、程雅妤、莊謹鳳、王智弘 (2021)。企業諮商中面臨企業與員工利益衝突之倫理判斷歷程研究。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62，117-152。[Chang, S.-H., Cheng, Y.-Y., Chuang, J.-F., & Wang, C.-H. (2021). The process of ethical judgment on managing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s between the enterprise and employees in workplace counseling.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62, 117-152. <https://doi.org/10.3966/172851862021090062004>]
- 張麗珠 (2023)。中國哲學史三十講。五南。[Zhang, Y.-Y. (2023). *The 30 lessons of Chinese philosophy history*. Wunan.]
- 程雅妤、張素惠、莊謹鳳、王智弘 (2022)。華人文化脈絡下高中職輔導教師多重角色衝突倫理判斷歷程之研究。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65，27-62。[Cheng, Y.-Y., Chang, S.-H., Chuang, J.-F., & Wang, C.-H. (2022). The process of ethical judgment on multi-role conflicts of high school counselors in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65, 27-62. <https://doi.org/10.53106/172851862022090065002>]
- 鈕文英 (2023)。質性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雙葉。[Niew, W.-I. (2023). *Qualitative*

-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sis writing*. YehYeh Book Gallery.]
- 黃光國（1998）。兩種道德：臺灣社會中道德思維研究的再詮釋。本土心理學研究，**9**，121-175。[Hwang, K.-K. (1998). Two kinds of moral: A reinterpretation of research on moral thinking in Taiwanese society.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9*, 121-175. <https://doi.org/10.6254/1998.9.121>]
- 黃光國（2009）。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心理出版社。[Hwang, K.-K. (2009). *Confucian relationalism: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empirical research*. Psychological Publishing.]
- 黃光國（2010）。反求諸己現代社會中的修養。洪業。[Hwang, K.-K. (2010). *Turn inward and examine yourself: Cultivation in modern society*. Hung Yeh.]
- 黃光國（2011）。學術之道的抉擇：談建構「含攝文化的心理學」。本土心理學研究，**36**，169-192。[Hwang, K.-K. (2011). The choice of academic path: Discussion about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e-inclusive psychology.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36*, 169-192. <https://doi.org/10.6254/2011.36.169>]
- 黃光國（2014）。倫理療癒與德性領導的後現代智慧。心理出版社。[Hwang, K.-K. (2014). *Postmodern wisdom of ethical healing and virtuous leadership*. Psychological Publishing.]
- 黃光國（2018a）。內聖與外王：儒家思想的完成與開展。心理出版社。[Hwang, K.-K. (2018a). *Inner Sagehood and Outer Kingliness: The comple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Psychological Publishing.]
- 黃光國（2018b）。社會科學的理路（第四版）。心理出版社。[Hwang, K.-K. (2018b). *The path of social scientific thinking* (4th ed.). Psychological Publishing.]
- 葉紹國（1996）。道德推理中關懷導向與正義導向思考之區辨及其在中國社會實踐的特徵。本土心理學研究，**5**，264-311。[Yeh, S.-K. (1996). The discrimination between care-oriented and justice-oriented moral reasoning und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society.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5*, 264-311. <https://doi.org/10.6254/1996.5.264>]
- 葉紹國（1997）。道德論說中西合璧之難。本土心理學研究，**7**，229-235。[Yeh, S.-K. (1997). The difficulty of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ethics in moral theory.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7*, 229-235. <https://doi.org/10.6254/1997.7.229>]
- 謝明瑾、王智弘（2016）。國民小學諮商心理師面臨保密議題倫理判斷歷程之敘說研究。臺灣諮商心理學報，**4**（1），17-43。[Hsieh, M.-C., & Wang, C.-H. (2016). A narrative research on ethical judgment process of counseling psychologists at

- elementary schools when facing confidentiality issues. *Journal of Taiwan Counseling Psychology*, 4(1), 17-43.]
- Ab Rahman, M. A., Mustapha, R., & Suparman, S. L. H. (2021). Islamic counselling practices among Muslim counsellor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 and Education Studies*, 1(1), 29-38.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0316969>
- Abdul Ghani, R., & Awang, J. (2017). A review on writings on religious tolerance in Malay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slamic Thought*, 12(1), 72-82. <https://doi.org/10.24035/ijit.12.2017.007>
- Abdul Rahman, N. F., & Mohd Khambali, K. (2013). Religious tolerance in Malaysia: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slamic Thought*, 3(1), 81-91. <https://doi.org/10.24035/ijit.03.2013.007>
- Abubakar, I. (2013). The religious tolerance in Malaysia: An exposition. *Advances in Natural and Applied Sciences*, 7(1), 90-97.
- Ahmad, Z. A., Ahmad, W. A. K., Mustafa, S. M., & Phillips, J. A. (2018). *HPGD2103 Guidance and Counselling*. Open University Malaysia.
-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2014). *2014 ACA code of ethics*. <https://www.counseling.org/docs/default-source/default-document-library/ethics/2014-aca-code-of-ethics.pdf>
- Awang, J., Ramli, A. F., & Ab Rahman, Z. (2022). Intercultural theology in the multicultural context of Muslim-Buddhist relation in Malaysia: History, identity, and issues. *Religions*, 13(11), 1125. <https://doi.org/10.3390/rel13111125>
- Barnett, J. E., & Johnson, W. B. (2011). Integrating spirituality and religion into psychotherapy: Persistent dilemmas, ethical issues, and a proposed decision-making process. *Ethics & Behavior*, 21(2), 147-164. <https://doi.org/10.1080/10508422.2011.551471>
- Bayne, H. B. (2016). Helping gay and lesbian students integrate sexual and religious identities. *Journal of College Counseling*, 19(1), 61-75. <https://doi.org/10.1002/jocc.12031>
- Bayne, H. B., Harness, L., & Neuer Colburn, A. (2022). Religious counselors and LGBTQ+ clients: A Q sort of value navigation. *Counselor Education & Supervision*, 61(2), 141-159. <https://doi.org/10.1002/ceas.12231>
- Beauchamp, T. L. (2011). The Belmont Report. In E. J. Emanuel, C. C. Grady, R. A. Crouch, R. K. Lie, F. G. Miller, & D. D. Wendler (Eds.), *The Oxford textbook of clinical research ethics* (pp. 149-15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haskar, R. (2008). *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 Routledge.
- Board of Counselor Malaysia. (2016). *Board of counsellors code of ethics*. Lembaga Kaunselor. https://7d1c7ff3-2224-4fc0-a77d-81926145ae5d.filesusr.com/ugd/65da1d_3976bd873d774a5d8256c12e97ff13c5.pdf?index=true
- Brooks, J., McCluskey, S., Turley, E., & King, N. (2015). The utility of template analysis in qualitative psychology research.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12*(2), 202-222. <https://doi.org/10.1080/14780887.2014.955224>
- Cashwell, C. S., & Watts, R. E. (2010). The new ASERVIC competencies for addressing spiritual and religious issues in counseling. *Counseling and Values, 55*(1), 2-5. <https://doi.org/10.1002/j.2161-007x.2010.tb00018.x>
- Corey, G., Corey, M. S., & Corey, C. (2019). *Issues & ethics in the helping professions* (10th ed.). Cengage Learning.
- Cormier, S., Nurius, P. S., & Osborn, C. J. (2016). *Interviewing and change strategies for helpers*. Cengage Learning.
- Cottone, R. R., Tarvydas, V. M., & Hartley, M. T. (2022). *Eth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 Crabtree, B. F., & Miller, W. L. (1992). A template approach to text analysis: Developing and using codebooks. In B. F. Crabtree and W. L. Miller (Eds.), *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93-109). Sage.
- Crockett, J. E., Rogers, J. L., & Binkley, E. E. (2021). Cultural dimensions of early pregnancy loss: Spiritual and religious issues. *Counseling and Values, 66*(1), 21-39. <https://doi.org/10.1002/cvj.12142>
- Dasti, R., Farhan, R., Naqvi, T. F., Sitwat, A., & Bokharey, I. Z. (2020). Ethical and moral dilemmas in psychotherapy: Applying a religiously sensitive framework to therapy. In B. Anisah & M. Mitchell (Eds.), *Working with Muslim clients in the helping professions* (Vol. 13, pp. 242-258). IGI Global. <https://doi.org/10.4018/978-1-7998-0018-7.ch013>
-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2018).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5th ed.). Sage.
-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2023, April 6).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Malaysia*.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https://www.dosm.gov.my/portal-main/article/population-and-housing-census-malaysia>
- Federal Legislation (2020, October 15). *Federal Constitution*. <https://lom.agc.gov.my/federal-constitution.php#>
- Francis, P. C., & Dugger, S. M. (2014). Professionalism, ethics, and value-based conflicts in

- counseli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section.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92(2), 131-134. <https://doi.org/10.1002/j.1556-6676.2014.00138.x>
- Garner, C. M., Webb, L. K., Chaffin, C., & Byars, A. (2017). The soul of supervision: Counselor spirituality. *Counseling and Values*, 62(1), 24-36. <https://doi.org/10.1002/cvj.12047>
- Herlihy, B. J., Hermann, M. A., & Greden, L. R. (2014). Legal and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using religious beliefs as the basis for refusing to counsel certain clients.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92(2), 148-153. <https://doi.org/10.1002/j.1556-6676.2014.00142.x>
- Hwang, K. K. (2012). *Foundation of Chinese psychology: Confucian social relations*. Springer.
- Hwang, K. K. (2019). *Culture inclusive theories: An epistemological strate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smail, N., Abdul Rahman, K. A., & Mohd Salleh, N. (2017). Kefahaman belia Muslim terhadap konsep kebebasan beragama dengan isu keluar agama dalam Islam: Kajian di Institut Pengajian Tinggi Selangor. *Al-Irsyad: Journal of Islamic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2(2), 54-67. <https://doi.org/10.53840/alirsyad.v2i2.18>
- Jackson, A. P., Hansen, J., & Cook-Ly, J. M. (2013). Value conflicts in psychotherapy. *Issues in Religion and Psychotherapy*, 35(1), 6-15.
- Jaladin, R. A. M., & Lau, P. L. (2016). *Professional and ethical issues in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University of Malaya.
- Jones-Smith, E. (2021). *Theories of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Sage.
- Kamarzaman, M. H., Mohd Rajoli, M. A. B., Kamaruzaman, M. A. S., Kamarudin, M. A. K., Mohd Zakarim, M. Z., & Rostam, M. N. (2024). Religious practices among Malaysia diverse socie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Research (Indore)*, 12(1), 680-686. <https://doi.org/10.21474/ijar01/18170>
- Killian, T., Levering, K. R., & Brottem, L. J. (2021). Understanding conflict between religious/spiritual and queer identities: A framework for counselors. *Counseling and Values*, 66(2), 145-162. <https://doi.org/10.1002/cvj.12154>
- King, N. (1998). Template analysis. In G. Symon & C. Cassell (Eds.), *Qualitative methods and analysis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pp. 118-134). Sage.
- King, N., & Brooks, J. (2016). *Template analysis for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students*. Sage.

- Kitchener, K. S. (1984). Intuition, critical evaluation and ethical principles: The foundation for ethical decisions in counseling psychology.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12*(3-4), 43-55. <https://doi.org/10.1177/0011000084123005>
- Kocet, M. M., & Herlihy, B. J. (2014). Addressing value-based conflicts within the counseling relationship: A decision-making model.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92*(2), 180-186. <https://doi.org/10.1002/j.1556-6676.2014.00146.x>
- Kohlberg, L. (1958). *The development of modes of thinking and choices in years 10 to 16*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 Kohlberg, L. (1984). *Essays on moral development, Vol. 2: The philosophy of moral development*. Harper & Row.
- LaMothe, R. (1999). The tragic and faith in Pastoral Counseling.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Health, 38*(2), 101-114. <https://doi.org/10.1023/a:1022921924397>
- Levitt, D. H., Farry, T. J., & Mazzarella, J. R. (2015). Counselor ethical reasoning: Decision-making practice versus theory. *Counseling and Values, 60*(1), 84-99. <https://doi.org/10.1002/j.2161-007X.2015.00062.x>
- 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Sage.
- McLeod, J. (2013). *An introduction to counselling* (5th ed.). Open University Press.
- McWhorter, M. R. (2019). Balancing value bracketing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moral values in psychotherapy: Evaluation of a clinical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tholic moral theology. *The Linacre Quarterly, 86*(2-3), 207-224. <https://doi.org/10.1177/0024363919856810>
- Meyer, J. (2023). *Universe and you: A search for universal moral value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DePauw University.
- Minnix, G. M. (2018). Reconciling counselors' Christian beliefs and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affirmation: A grounded theory. *Counseling and Values, 63*(1), 110-128. <https://doi.org/10.1002/cvj.12076>
- Mitchell, D. N. C. (2022). Value exploration of the counselor: A narrative approach for supervision. *Counseling and Values, 67*(1), 23-43. <https://doi.org/10.1163/2161007X-67010002>
- Neo, J. L. C. (2006). Malay nationalism, Islamic supremacy and the constitutional bargain in the multi-ethnic composition of Malay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inority and Group Rights, 13*(1), 95-118. <https://doi.org/10.1163/157181106777069950>
- Ng, J. Y., Hassan, S. A., & Aziz, D. A. (2021). A Counselor's cultural identity: Implications from a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perspective in Malaysia. *Asian Social Science, 17*(11),

18. <https://doi.org/10.5539/ass.v17n11p18>
- Ng, W. S. (2007). Psychotherapy in Malaysia: An overview. *Mental Health and Learning Disabilities Research and Practice*, 4(2), 205-218. <https://doi.org/10.5920/mhldrp.2007.42206>
- Patterson, C. H. (1989). Values in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Counseling and Values*, 33(3), 164-176. <https://doi.org/10.1002/j.2161-007x.1989.tb00758.x>
- Piaget, J. (2018). 結構主義 (王紹中譯)。五南。(原著出版年：1968) [Piaget, J. (2018). *Structuralism* (S. -Z. Wang, Trans.). Wuna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8)]
- Remley, T., & Herlihy, B. (2020). *Ethical, legal, and professional issues in counseling* (6th ed.). Pearson Education.
- Ritchie, J., & Lewis, J. (2014). *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 A guide for social science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 (2nd ed.). Sage.
- Robinson, E. H., III, & Curry, J. R. (2008).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and professional counseling research. *Counseling and Values*, 53(1), 39-52. <https://doi.org/10.1002/j.2161-007x.2009.tb00112.x>
- Shweder, R. A. (1982). Liberalism as destiny.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27(6), 421-424. <https://psycnet.apa.org/doi/10.1037/021204>
- Shweder, R. A., Goodnow, J., Hatano, G., LeVine, R. A., Markus, H., & Miller, P. (1998).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development: One mind, many mentalities. In W. Damon & R. M. Lerner (Eds.),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 1, Theoretical models of human development* (pp. 865-937). Wiley.
- Ting, R. S. K., & Ng, A. L. O. (2012). Use of religious resources in psychotherapy from a tradition-sensitive approach: Cases from Chinese in Malaysia. *Pastoral Psychol*, 61, 941-957. <https://doi.org/10.1007/s11089-011-0365-4>
- Van Hoose, W. H., & Paradise, L.V. (1979). *Ethics in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Perspectives in issues and decision-making*. Carroll Press.
- Wallner, F. (1994). *Constructive realism: Aspects of a new epistemological movement*. W. Braumuller.
- Wang, C. H. (2022). An inclusive theory of ethics based on Chinese culture: The duality model of professional ethics for helpers. In A. K. Giri & S. C. Wu (Eds.), *Cross-currents of social theorizing of contemporary Taiwan* (pp. 187-206). Palgrave Macmillan.
- Welfel, E. R. (2016). *Ethics in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Standards, research, and emerging issues* (6th ed.). Cengage Learning.
- 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 (2013). *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 declaration of Helsinki:*

Ethical principles for medical research involving human subjects. <https://www.wma.net/policies-post/wma-declaration-of-helsinki-ethical-principles-for-medical-research-involving-human-subjects/>

- Yadegarfar, M., & Bahramabadian, F. (2014). Sexual orientation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ethics code of the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organization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PCOIRI). *Ethics & Behavior*, *24*(5), 350-363. <https://doi.org/10.1080/10508422.2013.845733>
- Yew, W. C., Awang, A. H., Selvadurai, S., Mohd Noor, M., & Chang, P. K. (2021).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slam and Buddhism: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perspective. *Religions*, *12*(12), 1098. <https://doi.org/10.3390/rel12121098>
- Yusoff, Y. M. (2011). *Counselling and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values: A Malaysian study*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Waikato.
- Zakaria, N. (2017). *A comparison of the recognition of Islamic and Christian counseling in Malaysia*.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Sains Malaysia.

收件日期：113年12月09日

一審日期：114年06月09日

二審日期：114年09月01日

接受日期：114年10月15日

Ethical Decision-Making in Religious Value Conflicts between Counselors and Clients: A Case Study of Malaysian Chinese Counselors

Soo-Moy Koay

Shuhui Chiu*

Ya-Yu Che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ethic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Malaysian Chinese counselors when confronted with ethical dilemmas arising from conflicts between their own and their clients' religious values. In the Chinese sociocultural context, religion has long been interwoven with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forming what are known as the "three pillars" of Chinese society. Together, these traditions create a pluralistic and multi-religious cultural framework that deeply influences moral reasoning and interpersonal ethics. Consequently, when counseling issues intersect with religious doctrines, counselors and clients may encounter ethical dilemmas that are more complex and layered than those typically found in Western cultural settings. These dilemmas often involve tensions between professional ethical principles and personal moral beliefs, requiring counselors to balance beneficence, non-maleficence, and respect for client autonomy while maintaining their own religious integrity. In light of these cultural and ethical complexities, this study aims to address the limited empirical research on how Malaysian Chinese counselors, who are influenced by Chinese Confucian traditions and multireligious backgrounds, make ethical decisions when religious values conflict during counseling practice. Specifically, this study seeks to examine (1) how counselors recognize and interpret religious value conflicts, (2) how they navigate ethical reasoning and professional codes, and (3) the cultural resources or frameworks they rely upon to resolve such dilemmas. Adopting a qualitative research orientation, this study employed in-dept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o collect empirical data. Through purposive sampling, seven licensed Malaysian-Chinese counselors (six females and one male) aged 35-68 years, who self-identified as holding strong religious beliefs were recruited as participants. The research framework is grounded in Hwang's (2019) epistemological strategy for constructing 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 which synthesizes structuralism, constructive realism, and critical realism. The data

* Corresponding author: Shuhui Chiu, email: chiu.shuhui@gmail.com.

doi: 10.53106/172851862026010075003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template analysis method, a structured qualitative technique, to extract recurring patterns of ethical reasoning and decision making.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ethic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mong Malaysian Chinese counselors facing religious value conflicts reflects a dual ethical structure. This duality – comprising both "external rational objective norms" and "internal subjective self-cultivation" – is consistent with the Duality Model of Professional Ethics for Helpers proposed from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Wang, 2018; Wang, 2022). Counselors were found to move through four stages of ethical consideration: (1) professional conflict in helping others; (2) informed-consent judgment; (3) ethical judgment; and (4) ethical ac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During these stages, counselors not only adhered to professional ethical codes but also engaged in introspective moral reflection guided by Confucian notions of self-cultivation and harmony. Furthermore, the results support the view that ethical judgments in religious value conflicts follow a dual (two-dimensional) developmental model in which introversion and extroversion occur simultaneously. This finding contrasts with the sequential one-dimensional model suggested by Van Hoose and Paradise (1979), which, following Kohlberg's (1958) moral development theory, proposed an external-to-internal progression. The study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Chinese counselors' ethical decision-making operates dynamically between outward adherence to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the inward cultivation of moral character, reflecting a uniquely Confucian ethical synthesis. In conclusion, when confronted with conflicts between their own and their clients' religious values, Chinese counselors tend to rely on universal ethical principles derived from multicultural humanistic values rather than narrowly defined religious doctrines. This orientation allows them to uphold their professional integrity while maintaining their cultural and spiritual sensitivity.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integrating the Confucian concepts of relational harmony and moral self-cultivation into counseling ethics education. Practical implications suggest that counselors should explicitly clarify their personal religious values in professional practice, and that counseling institutions should enhance awareness and training concerning religious issues in ethical decision-making.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cultural competence and a reflective ethical mindset is essential for addressing value-based conflicts in counseling within pluralistic societies such as Malaysia.

Keywords: Chinese counselors, duality model of ethical decision-making, Malaysia, religious value conflicts.

